

# 从“身份”到“职业”

## ——职业农民发展的喜和忧

□ 本报记者 杨雪

### ■ 观点速递

### 长城战略咨询发布《产业价值链运动三规律》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晶)日前,长城战略咨询发布最新研究报告《产业价值链运动三规律——分解、融合、新业态》。报告首次诠释了产业价值链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提出在创新全球化时代,业态创新与产业原创是中国经济走向创新驱动的必由之路。

报告指出,业态创新推动着产业发展的不断变革,加速了产业价值链的运动。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最初是商品全球化推动制造业全球布局,产业价值链开始分解,福特等跨国汽车制造商出现;随后,产业边界日趋模糊,产业价值链日趋融合,以沃尔玛为代表的综合服务商提供商出现;近年来,在金融危机洗礼下,世界开始进入以科技创新全球流动为特征的创新全球化时代,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新业态蓬勃发展。

报告提出,价值链的运动源起于企业的商业模式变革,分解、融合、新业态是价值链运动的三种经典模式。业态创新是价值链运动的基本表现形式,产业细分和产业重构是价值链运动导致的必然结果。“三规律”可广泛应用于产业链中的企业内部和企业间、产业内和产业间分析,服务于企业、产业与区域咨询;高层建筑地把握产业的源头与尽头,源头分解再分解,尽头融合再融合,突出创新在产业运动中的核心地位与作用,为新经济咨询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分析工具,鼓励创新与产业试错,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产业原创之路。

### 共青团中央提案:

### 聚焦“净化青少年上网环境”

科技日报讯(记者贾婧)网游行业的现状给未成年“玩家”的身心健康带来“巨大危害”,个别以经营成人游戏为主的企业,不仅利润丰厚,还能获得高额的相关补贴;而那些不设门槛、低收费的绿色网游公司却无法生存。事实上,共青团界别的委员早已注意到类似问题。记者从共青团中央获悉,今年两会,他们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净化青少年成长的网络和新媒体环境的提案》。

该提案称,目前我国青少年网民已达2.35亿人,占网民总数的41.6%。从各级团组织的调研情况看,青少年在信息获取、交流沟通、休闲娱乐和商务交易等方面对网络和新媒体依赖越来越明显,特别是手机已成为青少年最主要的上网终端,微博、微信、QQ等已成为青少年了解社会、沟通联系的主要渠道。

《2012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显示,青少年网络游戏使用率为68.4%,高于网民总体平均水平;其中小学生网民是网络游戏使用率最高的群体,高达87%。

与中小学生对网络游戏的高度热衷相对应的,是当前网游极高的“成人化”水平。据中青网游戏频道统计,截至今年2月12日,其测评的856款网游中,成人游戏有638款,而适合未成年人的绿色游戏有218款,仅占总数的25.5%。

针对这些情况,团中央在提案中建议:首先健全立法,制定针对青少年的网络使用、信息安全等法律法规;其次强化政府监管,建议公安、工信、文化等职能部门定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综合运用行政、技术和宣传手段,对网络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做到“零容忍”,建议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健全“网络游戏分级制度”“网络产业审批管理制度”等,明确网络、电信运营者的职责;继续加强网吧和校园周边文化环境整治;加强国际合作,封堵境内外非法站点,联合开展打击跨境网络违法犯罪活动。

在中国人的字典里,农民是一种身份,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他的工作方式,文化水平低是他的自然属性。几千年来,乃至今天的大部分地区,我国农民都是以这种“传统农民”(peasant)的形态存在。因此,在

### 农民也能“高大上”

两年前,北京的石嫣女士在通州投资30万,承包了40亩地,办起了农业生态园。“我们做的是社区支持型农业,会员制,接受预订后再进行种植和养殖,然后把农产品送货上门”,石嫣告诉记者,不到两年的时间,她已经用盈利把通州这片地扩展到140亩,目前拥有500会员。去年,她又又在顺义投资80万,承包了50亩地,目前也已经拥有100多会员。

近些年,已经有不少像石嫣这样在农村承包土地,荒山、林场、水域等开展农业创业的“城里人”,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乐呵呵做起了“农民”。“城市居民不仅拥有资本,还享有知识和信息的优势,他们可以更好地从市场角度来考虑农业生产,也更有可能拓展农业产业链,做大做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刘冬梅研究员告诉记者,在经济效益的吸引下,原本在城市创业的拥有雄厚资本的企业家,也开始进入农村市场。企业家的加入可以迅速发展规模化经营,带动农产品加工、包装、销售等二、三产业的发展。

传统农民也正在“转型升级”,成为职业农民,例如在大中城市周边经营生态采摘、园艺、有机作物种植等与农产品相关的商业,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一些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农业经纪人、合作社带头人等。他们从生产到销售都遵循着市场规律,在市场中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已经走上农业产业化发展之路,正在进行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的角色转换。

据刘冬梅介绍,职业农民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开展“理想”遭遇现实尴尬

### “理想”遭遇现实尴尬

传统农民对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情感,最了解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是发展成为职业农民的主力军。“但他们欠缺一些专业技术、管理知识,加上本身文化素质较低,接受知识的能力也就有限,而且他们在产后环节面向市场的能力较弱”,刘冬梅指出,对这些传统农民开展培训的成本较高,服务的针对性很难保证。农村的空心化已经使得传统农民的数量大幅度削减,转变为职业农民的数量就更有限。

“城里人”能够在城市周边的农村从事一些农业经营,但难以深入农村,除非有巨大的利润吸引,所以这支队伍的规模也是有限的。农村卫生条件差,没有

发达国家早已体系成熟的“职业农民”(farmer),对我国而言还是一个新词儿。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将来,农民将取代“身份”,成为一种职业。

### 职业农民发展的喜和忧

农业经营,涉及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物流、中介服务,管理多个环节,所从事的工作包括各个方面,通过更多的市场手段配置农业生产资源,来实现经营利润最大化,大致可分为四类。

其中,经营型职业农民要求较高的职业技能,从事现代农业的经营管理,例如涉农企业、农业中介组织等,位于职业金字塔的顶端。服务型职业农民,围绕现代农业产业链开展专业性服务,包括农业流通、加工企业、农业服务中介组织等。生产型职业农民主要从事农业某一方面的生产活动,如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等。这两种职业农民是队伍的主力军。家庭型职业农民主要以家庭的独立经营为主,与现在一家一户的农业经营不同的是,其专业生产能力更强,以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为典型。

另外,在我国服务了多年的农技推广体系,目前拥有农技人员71.48万人。这些农技人员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在农村的多年实践中也积累了大量农业生产经验,比较了解农村社会情况。同时他们本身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能更好地了解市场信息,他们是发展成为职业农民的潜力军。

国外的职业农民一般要经历过专业培训和职业认证,拥有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有较高的职业威望。“未来的职业农民应该是一种专业化强、准入门槛高、收益也高的职业,但在我国的发展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刘冬梅说。

### “理想”遭遇现实尴尬

大超市,没有网络,没有咖啡厅,没有酒吧……习惯了城市的小资生活,就算是从农村考出去的具有做职业农民潜质的年轻人,也已经适应不了农村的生活条件,很难再回到农村去。

企业家的生产经营也许可以深入农村,却难以融入当地。“我们在河北太行山区调研的时候,就碰到过承包荒山种果树的企业家,到果树挂果期遭遇当地农民抢果子的事”,刘冬梅告诉记者,城市周边的农村可能包容性强一点,但是偏远一些农村,还是存在对外来户的排斥。“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涉及土地流转成本和收益保障的问题”,刘冬梅



说,“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受到现有农用地政策的局限,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也比较高”。

农技人员虽然有一定的技术经验和眼光,但随着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他们的知识结构开始显得单一和老化。他们过去主要在产中环节进行指导,已经不

### 科技特派员应该成为职业农民先锋队

就全国范围来看,宁夏职业农民的发展情况比较好,5000多人中,近15%来自于乡土人才,近10%来自于农技人员。“我们对当地农民的调查发现,他们需要满足现实需求的培训,而不是泛泛培训”,刘冬梅指出,要重视支持当地教育,把人才留在农村。在顶层设计上,应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给予扶持和帮助,为城市企业家进入农村创业提供政策便利,鼓励现有基层农技人员在农村创办企业。

结合宁夏的经验,刘冬梅谈到科技特派员制度。科技特派员制度其实就是鼓励科技人员深入基层开展服务创业,与当地农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他们将科技服务渗透到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将现代生产要素植入生产一线,将生产、技术与市场联系在一起,对当地农

民适应现在产前、产中、产后协同联动的要求,综合性服务能力有些跟不上。而且他们在“体制内”领取工资,就算搞规模化经营,利润基本和他们没有关系。如果从低待遇的“体制内”跳出来,又涉及户籍、医疗、养老等一系列问题,“总之很复杂,所以他们这个转换角色的动力是不足的”,刘冬梅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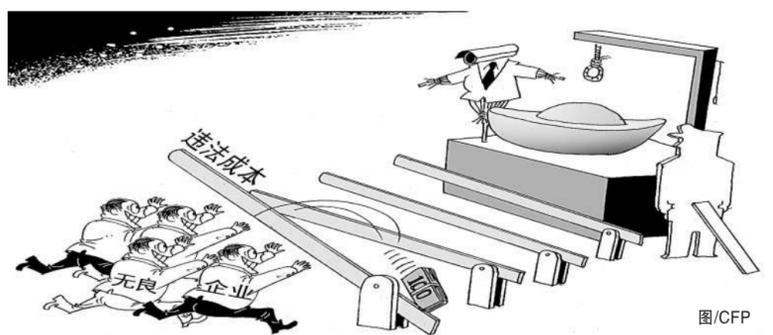
科技特派员应该成为职业农民先锋队

民还有带动作用。“在现有资源有限且不变的情况下,科特派平台能够盘活现有资源,协调当地财政、农业、科技以及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与联动,比如能够打破一些体制障碍”,刘冬梅举了一个例子:对于一些在机关、事业单位、高校、院所等“体制内”有知识有技术的高素质并且有农村创业想法的人,科特派制度能够允许他们带薪留职,鼓励他们“拥抱土地”进行创业。

那么科特派是不是可以解决前面提到的农技人员的尴尬?“这仍然需要各部门的协调沟通”,刘冬梅认为,“发展职业农民,关键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推动现代生产要素进入农村,现阶段看来,将目前的72万名科技特派员发展为职业农民的先锋队,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 重罚解决不了食品安全问题

□ 陈雍君



图/CFP

### 千言时评

和往年一样,今年的3·15晚会曝光了一批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及其商业行为,其中关于过期食品加工原料的报道触目惊心。节目播出后,除了当地工商执法部门紧急出动进行执法以外,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总局于近期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对超过保质期

食品监管工作,并要依法加大处罚力度。销售过期食品损害人体健康,对其重罚理所应当,但仅仅加强监管、严厉处罚,是不是就能解决此类问题呢?

毋庸置疑,凡是销售有损人体健康的食品,无论是原材料、成品还是地沟油,都是罔顾大众生命健康的不负责任行为,对其进行包括经济惩罚、刑事追究等打击手段都不为过。但是,这些惩罚手段都应该仅仅作为

最后手段,是对于偶尔出格行为划定的高压线。倘若这些惩罚成了日常的管理手段,那么要不就是条件过严,要么就是被管理者被逼无奈,只好铤而走险。

不妨针对此次被曝光的过期食品原料一事进行简单分析。一旦出现过期产品,商家总不能就那么一直堆放着,要么换包装销售,要么销毁,要么找其他渠道卖出去。换包装的话,库存和再次包装需要追加成本,最后也未必盈利,而且还冒着违法、被吊销执照的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销毁,在哪里销毁?不少商家都发现过期食品的销毁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处理单位、场地、善后都要花钱,销毁一批货物代价高昂;如果找渠道出售呢?在最大电商平台阿里巴巴上可以查到,接单采购过期食品的企业屈指可数,而且往往只针对极少数品种的食品。

现实情况是,商家要么就甘愿付出高昂法律成本和诚信成本,把过期食品重新包装上市,将企业运营损失降到最小,要么坚持诚信和法律约束,将过期食品高价销毁,或导致企业运营受困,甚至倒闭。两害相权,短视的企业主往往选择前者,所谓“先过了这个坎再说”。当然,这不是要为失责的企业找借口或为其脱罪,而是要提醒我们自己,制度或者说游戏规则

则是否已跟不上时代发展。

现代商业社会必须由诚信搭建而成。而诚信的来源,除了文化底蕴、社会责任这类道德意识,还来自于经营的可持续发展。假如经营者一手是道德,一手是生存,那么选择生存而抛弃道德的企业难免会占多数。这并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对此,规则制定者和管理者必须充分考虑到企业家的博弈困境,并给其有足够的施展余地,手中偶尔扬起的皮鞭才更有说服力。

具体而言,管理部门在监管企业销毁过期食品的工作时,除了一再让企业做出承诺并定期检查之外,是否可以设法给予企业一定的经济补偿?例如,政府投资兴建专业的过期(不良)食品回收销毁站,替商家承担一部分销毁过期食品的成本,同时也藉此建立生产企业和商超销毁过期食品记录档案;此外,倡导过期食品的再次开发利用,扶持相关研究和企业,帮助建立过期食品的再利用渠道。当这些政策性措施缓解了企业经营上的后顾之忧,诚信才有可能逐渐在企业行为中被奉为圭臬,而那些严惩条例才真正成为最后底线。

总之,正所谓“堵不如疏”,能否为企业剔除过期食品处理的后顾之忧,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理想办法,而同样的思路和方法当然也适用于地沟油、问题奶粉等顽疾。李克强总理说政府要简政放权,简政放权的核心思想就是构建服务型政府,而服务型政府的具体表现,就是多解决实际问题,少挥舞皮鞭。

### ■ 决策视野

□ 田俐 李林

# 青海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原因与对策

青海省作为一个资源型省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影响,在推动发展方式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着比中东部省份更大的挑战,其中,科技金融能力不足特别是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模小、企业直接融资能力不足等,已成为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制约因素。为此,需要深入剖析青海省中小型企业科技融资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寻找符合青海省情的有效对策。

青海省国有科技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简称青海国科)对青海省近200家高新技术企业及科技型中小企业所做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存在的主要困境及其原因如下:一是仍以固定资产抵押为贷款主要方式。银行狭隘理解“国家相关规定对中小企业贷款,必须要有(固定)资产抵押”的规定,认为科技型企业为轻资产公司,所具有的土地、专利权等权益不能当固定资产对待,因而封杀了专利质押等贷款渠道。例如,青海业

绩较好的10多家中小型企业曾到西宁市的几家银行申请专利质押贷款,但最终只有交通银行青海分行分别给其中的两家提供了专利质押贷款300万元、1000万元。

二是债券、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的比例很低。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发行公司债券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多数中小企业显然难以满足此项规定。实际上,青海国科曾多次尝试与政策性银行商讨“青海省中小型企业集合债”发行办法,最终都未成功。同时,尽管股权投资是一种非常适合中小型企业融资的方式,但由于青海省的中小型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不熟悉此种融资方式,加上政策的扶持力度弱以及中小型企业发展的风险较大,导致实施情况不佳。

三是政府扶持资金投入方式陈旧。尽管中央和青海省财政用于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资金近年来显著增加,但由于受大政策环境及人员少等因素的影响,

财政部门对接付资金使用情况的跟踪检查及问责、审查工作相对薄弱,部分企业使用财政资金行为存在不规范,其结果是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不高,财政政策的导向、助推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不规范。青海省的中小型企业财务管理很不规范,影响了融资信誉和投资效果。例如,青海国科在对一家企业自报的财务报表、行业前景、政府职能部门进行评价时发现,该企业早已被吊销税务登记证,财务审计报告没有帐簿支持,企业也从未做过记账凭证,却持续经营了五、六年之久,并拿到过不少财政资金。

五是过度避税因小失大。青海国科在对符合创业板、新三板要求的企业进行的财务调查发现,他们自报的财务数据与实际通过第三方审计的报表数据不符者为数不少。相当一部分企业主要靠自我积累艰难发展,为生存而采取避税的方式,因而不愿如列支农副产品、技术咨询等支出,造成企业成本核算和财务管理混乱,最终使得融资机构不愿

为其提供贷款。

六是缺乏企业战略规划。青海信息相对闭塞,企业家求变、求新愿望不强,战略规划缺乏,囿于“小富即安”。例如,一家土生土长生物科技子公司,产品为利用青海特色植物的配方制成的保健剂丸,尽管企业负责人曾经希望青海国科作为战略投资者进入,参与企业的市场开拓、经营管理,但最终却因害怕企业主导权旁落他家而放弃。

面对中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趋势,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要避免青海省在新一轮竞争中再次落后,就必须尽快行动起来,着力解决中小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此,可考虑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成立一家财政参股、投、贷结合的“硅谷银行”。借鉴美国硅谷银行“(股权)投资+(债权)贷款”的经营模式,面向创业企业和创投基金提供金融服务,在此过程中通过与创投基金的联动来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从而解决中小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二是改进财政资金直接资助企业的融资模式。可以把财政资金无偿留给企业额度的大小与企业投资项目实施效果挂钩,对企业借用资金的绩效评价分为“优”“中”“差”几个等级,收回资金的比例依次为10%至100%不等。如果被扶持企业未完成项目合同约定的主要目标,绩效评价结果为“差”的,或者以完工项目套取财政扶持资金的,全额收回拨付的财政资金,并在一定年限内取消该企业享受国家财税优惠政策资格。如果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经营稳定,财务状况良好,具备长期扶持价值,经被扶持企业董事会等类似权力机构同意,也可按法律程序将被扶持企业的债权转为股权投资。

三是充分发挥投融资平台的咨询服务和宣传推广功能。平台通过主办讲座、论坛、沙龙、一对一辅导等形式有效开展政策融资、股权投资、权益融资等融资方法,及其企业利用研发投入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合理避税实操经验进行宣传、讲解,还能就企业财务管理提供人力、物力上的直接指导与支持,改善经营管理。

四是尽快改革政府扶持资金投入方式。参考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做法,建议对政府扶持资金的评价采取“注重指标量化,变模糊为清晰”和“注重结果应用,变重资金为重责任”的原则。学习科技部中小型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做法,建立投资前的标准化遴选体系和投资时的系统化业绩考核标准,广泛使用投资机构惯用的《法律意见书》《财务审计报告》《大股东承诺回购函》、尽职调查等风险控制工具。

只有不断创新财政资金支持方式,那些产品市场容量大、发展前景好、合法纳税、安排就业人员多的企业,就会得到财政资金更多的支持。青海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将会越来越好,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和股权投资机构发展的资金盘子才会越来越大,从而形成正向的良性循环,从根本上解决青海省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

(作者单位:青海省国有科技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投资服务中心)